

# 重塑香港华人的族群地图

——华人移民认同和族群建构的再认识

王 苍 柏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redefine ethnicity and identity of Chinese diaspora. By examining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Indonesian Chinese managed to locate themselves in an “ethnic niche” in Hong Kong, it re-maps the sub-ethnic landscape of Chinese diaspora, which is more complex, dynamic and sensitive than what have been assumed. This study unveils that it is no longer adequate to understand identities in terms of old categories such as “place of origin” and dialect affiliation. Many Chinese migrants resort to invented bonds and transnational linkage for social groupings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By responding to new environments in such an innovative way, the Indonesian Chinese not only create another layer of Chineseness but also raise theoretical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Chinese ethnicity in a world of increasing mobility and globalization.

中国人移居海外由来已久。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至少在国内,华人移民主要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sup>①</sup>然而,近十余年来,该问题开始引起国际上来自不同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sup>②</sup>这一方面固然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移居海外的人数增加和国际交往扩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在华人移民进程中所呈现的“族裔散居”、“杂交性”和文化的“流离失所”等问题,与目前学术界中有关后殖民主义、后现代和全球化的讨论不谋而合。它呼唤我们“对过去习以为常的诸如种族和认同等概念进行理论和政治上的重新定义”(Clifford, 1992: 108)。显然,这已经超出了历史学或者某个专门学科的界限,涉及到目前人文和社会科学前沿的理论话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作为世界史最大和最古老的散居者……以及它可观的数量,华人移民无疑是当今全球化世界的主要例证和表象之一。因此,他们是我们考察全球化的扩展和当今社会众多关系的一个恰当的出发点”(Ang, 2001: 75—77)。

本文旨在依据香港的经验,对华人移民的认同和族群建构进行理论反思。关于族群(ethnic group)的中译及其含义,在大陆学界一向众说纷纭(参见阮西湖, 1998; 纳日碧力戈, 2003; 郝时远, 2003; 潘蛟, 2003)。在本文中,族群是指同一种族内部由于认同基础的差异而形成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人群聚合体,是种族(ethnicity)以下的另一个分析层次。它是与“次种族”(sub-ethnicity)相对应的概念,强调的是种族内部的多样性。<sup>③</sup>就海外华人而言,由于他们在移入国选择、移民时间长短、同化程度、籍贯、方言、行业、教育等方面的不同,从来就不是一个同一体,而是由不同的族群所组成的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性的“分群结构”(the segmentary structure)(Crissman, 1967)。其中,籍贯和方言一直是华人认同的主要基础和划分族群的核心标准,从而在华人社会中形成若干“方言群”(dialect group)。尽管在不同的所在国(所在

① 例如,目前国内关于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惟一的全国性学术刊物,是由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编辑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2002年,中国华侨出版社推出由北京大学周南京教授主编的十二卷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该书整合了国内研究华人的主要力量,其中历史学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②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ISSCO)的成立。该会由王康武教授和王灵智教授等人发起,在不同的地区设立分会。自1992年成立以来,吸引了国际上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加入,使华人研究日益成为跨学科领域。到目前为止,已经举行了5次大型国际研讨会。最近一次于2004年5月在丹麦举行。

③ 目前在华人研究领域,对族群(次种族)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例如,2003年9月在多伦多大学举行了题为“Subethnicity in the Chinese Diaspora”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据笔者所知,这是第一个专门以华人移民“次种族”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它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该问题的研究价值和迫切性。

地), 华人方言群的构成情况不尽相同, 但上述族群的划分原则几乎在所有的华人社会都存在。例如, 香港的华人口主要由 5 个族群构成, 即广东人、福建人(主要来自闽南)、潮州人、客家人和上海人 (Sparks, 1976; Guldin, 1977, 1997; Wong, 1988; Lin, 2002a, 2002b)。长期以来, 这些群体成立了自己的地缘性社团(同乡会), 并且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各自的族群认同。来自中国内地的新移民, 继续按照地缘的原则, 源源不断地加入这些业已成立的同乡会, 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以籍贯为基础的族群划分和族群建构(Sinn, 1997, 2002)。近 20 年来, 籍贯和方言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世界性华人宗亲同乡组织不断涌现, 各种活动方兴未艾(Liu, 1998; Douw et al., 1999)。同时, 海外华人与中国特别是其祖籍地(亦或叫“侨乡”)的联系有不断“复兴”的迹象, 越来越多的跨国性华人聚会在中国大陆的侨乡举行, 以至于“侨乡链”(Qiaoxiang Ties)已经成为华人研究中的一个颇为流行的新用语(Douw et al., 1999; 庄国土编, 2000)。

然而, 在整个世界日益呈现出全球化和流动性的情况下, 华人的移民模式、认同机制和族群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有必要关注新的移民类型, 它“强调合同关系, 间歇性地穿梭往来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或短时间地逗留。这种移民方式与永久定居和排他性的获得居住国的公民权的旧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Cohen, 1997: 135)。用人类学家詹姆斯·克利夫德(Clifford, 1992: 108)的话来说, 他们“在居住中旅行, 在旅行中居住”。这种新型移民本身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全球化的浪潮而变成“太空人”或者“漫游者”, 以地缘和方言为单位划分族群的简单和静止方法, 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作者认为, 在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 华人移民的认同不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一个不断选择和再选择的过程。对许多华人而言, 当籍贯和方言已经失去了认同的意义时, 他们可以创造性地适应环境, 改造旧的认同原则或者“发明”新的认同基础, 创建出新的华人族群。因此, 我们既看到残留的在传统籍贯和方言基础上划分的华人族群, 也可以看到不断涌现的在各种新的社会关系基础上划分的华人族群, 以及各种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族群构成之间的相互转化。全球华人的族群地图因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动不居和复杂多样的面貌。

作为华人移民的枢纽和门户, 香港华人社会的族群构成和演变为我们研究以上问题提供了天然的实验室。本文将通过对印尼华人在香港寻找“族群壁龛”(ethnic niche)过程的考察, 揭示当代华人族群演变的内在机制和特点, 用以证明作者在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设, 并以此推动对全球化条件下华人认同、“华人性”和相关问题的探讨。

## 材料和方法

在本文中, “香港印尼华人”一词指在印尼出生, 20 世纪 50、60 年代回到中国内地, 又在 70、80 年代移民到香港的中国移民。同理, “香港的东南亚华人”指那些具有东南亚背景、现居香港的华人移民。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 出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或继续接受华文教育的愿望, 大批东南亚华侨尤其是华侨青年陆续“回”到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了 20 年, 对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也有不少人因为有海外关系的原因, 在历次政治运动当中受到了冲击和迫害。从 70 年代开始, 当中国调整侨务政策, 放宽对归侨及其家属的出境限制后, 他们中的许多人离开中国大陆, 来到了香港。<sup>①</sup>

目前, 香港约有 30—40 万东南亚华人。其中, 印尼华人约有 10—20 万人, 占其中的大多数 (Godley & Coppel, 1990a: 94; 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 1995; 李海天, 1987)。他们初抵香港时, 除了从国内带来的少量退休金之外, 几乎一无所有。大多数已人到中年, 而且在香港既没有社会背景, 也没有工作经验。虽

<sup>①</sup> 关于印尼华人回国以及在国内的经历, 最早也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和精辟的分析见 Godley, 1989: 179—198。

然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其中有超过10%的人是医生、工程师、大学教师等专业人士。但是,他们的文凭不被港英当局所承认,因此,在来港的初期,大多数人只能在电子和车衣厂打工,做建筑工人或者在酒楼食肆干杂活,靠从事辛苦的体力劳动谋生(李海天,1987:25;《镜报》,1979、1980、1982;《华人月刊》,1984)。此外,他们还和其他大陆移民一起,饱受社会的歧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香港报章杂志中,不难看到类似“阿灿”、“绿印客”和“大陆仔”这样带有贬义的字眼,被用来称呼来港新移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被等同于落后、无知、贫困和可笑,甚至被当成香港治安恶化和经济萧条的原因(澄雨,2001:196-197;《七十年代》,1980)。

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印尼华人逐渐安定下来。不少人开始改行做生意。由于他们和印尼以及东南亚诸国的天然联系,加之在中国大陆的生活经历和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很多企业在中印(尼)贸易方面找到用武之地;另外一些人,尤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如医生和建筑师等,通过港英政府的专业资格考试,获得从业资格,从而跻身香港的专业人士行列。更多的人在大大小小的公司中做雇员,从一般职员到高级管理人员,都不乏其人。就整体而言,印尼华人在香港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并不显赫,只有少数人通过从商得以晋身社会的上层。<sup>①</sup>

到2002年,东南亚华人在香港成立了大约48个社团。<sup>②</sup>如果按国别来分类,其中有28个是印尼华人社团,占58.3%。在各国华人社团中,也是以印尼华人为主(见表1)。如果按照社团性质分类,在全部社团中,校友会占了绝大多数,有32个之多,占总数的66.67%(见表2)。校友会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海外华文学校为基础成立的校友会;另一类是以在中国内地的华侨补习学校或大学为基础成立的校友会。前者占到校友会的大多数,在全部32个校友会当中,有23个是这种校友会。它们不但是这些团体的主体,也是最为活跃的一类。

表1 香港东南亚华人社团的国别分类和总数

国别	数量	百分比
印尼华人社团	28	58.33
缅甸华人社团	2	4.17
新马华人社团	2	4.17
泰国华人社团	1	2.08
多国华人社团	15	31.25
总 数	48	100

资料来源:根据香港诸东南亚华人社团期刊发表的数字综合而成。

表2 香港东南亚华人社团的性质分类和总数

性质	数量	百分比
校友会	32	66.67
地缘团体	13	27.08
研究机构	1	2.08
综合团体	2	4.17
总 数	48	100

资料来源:根据香港诸东南亚华人社团期刊发表的数字综合而成。

考虑到印尼华人是香港东南亚华人的主体,以及在印尼华人团体中,以海外华文学校为基础的校友会的主导地位,本项研究以一个印尼华人校友会——香港巨港中学校友会[Palembang Chinese Schools Alumni Association(HK)]为重点,同时兼顾其他印尼华人群体。选择巨港中学校友会的原因是基于它的代表性和可行性。<sup>③</sup>它不仅是香港所有印尼华人校友会中最早一批成立的,而且也是组织最好和最为活跃的。同时,它的规模介于大型和小型校友会之间,比较利于个人开展的研究活动。在集中考察巨港华人群体的同时,本文也搜集和利用了大量其他印尼华人群体的资料,并且始终把巨港华人放在整个香港东南亚华人的图景之上进行对比,力求达到更为全面和平衡的结果。

本文采用了访谈、参与观察和档案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1999—2001年的3年间,作者采访

① 我的一个被采访人,同时也是香港东南亚华人社团的领袖告诉我,根据他的观察,只有大约5%的香港印尼华人成为了企业家,其他绝大多数都是打工仔。这一结论也为很多香港华人出版物的报道所证实。比较著名的香港印尼华人企业家有黄鸿年(中策集团主席)、曾星如(曾星如地产有限公司主席)和陈玉书等(繁荣集团主席)(陈禹山,1990)。

② 目前没有关于香港东南亚华人社团的现成数字可寻。然而,我注意到,在每次大型的跨社团活动之后,所有参加的社团名单都会登载在会后出版的纪念特刊当中,而这些名单又大体上是重复的。这些特刊包括“香港华侨华人总会”出版的通讯,以及“香港华侨华人总会”和“香港侨友社”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而出版的纪念特刊等。据此,我推测所有主要的华侨社团都参加了这些活动,而这些名单可以作为统计香港东南亚华人社团的比较可靠的依据。我和不同人的访谈也间接证明了这种推测的正确性。

③ 巨港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关于巨港中学校友会的一个前期研究,参见王苍柏,1999:55-66。

了60位印尼华人。其中40位是目前生活在香港的巨港华人,包括商人、公司职员、医生、工程师和教师等。在上述正式的访谈之外,还利用参加他们活动的机会,进行了无数次非正式的访谈。为了获得更加全面和均衡的资料,作者还采访了生活在香港之外的巨港华侨,以及来自其他群体的印尼华人。前者包括15位生活在广东、北京、雅加达和印尼巨港的巨港华人,后者包括5位其他香港东南亚华人社团的领袖或者活跃分子。在所有60人当中,12位是女性,48位是男性。这些访谈资料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资料。此外,作者还定期参加巨港华人在香港组织的各种聚会和活动,并到他们的出生地——印尼巨港进行了实地考察,以搜集资料和加深对他们侨居地的感性认识。最后,档案分析和史料的利用也是本研究所用方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作者收集和参考了大量香港各个华人社团的期刊和其他出版物,香港各种报纸和杂志当中有关印尼华人的报道,中国政府历年的侨务政策,以及有关印尼华人的史料等。

## 认同的困境

众所周知,香港人口的主体由来自中国大陆(以广东和福建为主)的移民所组成。一般而言,大多数来港新移民很快认同了在香港的自己所属的方言群体。他们或者加入已经成立的同乡会,或者按照籍贯和方言的原则,组成新的同乡会(Sinn, 1997: 394—395, 2002: 4—8)。然而,香港的印尼华人及其他东南亚华人则鲜有加入自己所属籍贯或方言同乡会的。即使是原本籍贯就在广东,讲广东话的那部分印尼华侨,也并没有认同当地的同乡社团。相反,他们纷纷成立自己独立的团体,主要是以海外华文学校为基础的校友会。<sup>①</sup>此外,传统的华人社团往往扮演着海外华人社会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文化和认同的掇客”(Kuah & Wong, 2001: 210—211)的角色。这种定位充分表现在诸如香港某些同乡会的所谓“植根香港,心系故乡”的标语当中(Sinn, 1997: 397)。但是,在印尼华人的校友会以及其他类型的华人团体当中,这种“掇客”的角色却无迹可寻。以上情况在香港社会乃至整个华人移民历史上都是从来没有过的。

从采访中得知,校友会实际上是大多数香港印尼华侨所参加的惟一团体。他们一般很少参与和介入非华侨的诸如同乡会之类的组织。这可以从以下两点加以证明。第一,巨港中学校友会在过去10年参加了4次跨社团的大型活动,每一次都是与其他东南亚华人社团共同举办的,而和其他非华侨团体没有任何明显的组织上的联系。第二,巨港中学校友会理事的兼职,也主要是在华侨团体内部进行。例如,在第七届理事会的全部29位执行理事当中有7个人分别在其他团体中兼任职务。在这7个团体中,有5个是东南亚华人社团,一个是以东南亚华人为主的综合社团,只有一个是同乡会。有趣的是,这个“乡”并非该理事的籍贯所在地福建,而是她回国后安置和生活的地方——云南。正如她所言:

尽管我是福建人,我并没有在那里出生,也从没有回过福建。云南是我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惟一地方。对于其他地方,我一无所知。我只参加了两个社团,一个是巨港华中校友会,一个是云南同乡会,这就足够了。如果让我参加福建同乡会,我反而会觉得很奇怪。

香港印尼华人的这种认同困境的确令人费解。文化的差异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除了原籍广东珠江三角洲的部分移民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会说广东话,因而在移民香港的初期,都面临着语言的障碍。即使在香港生活了几十年之后,很多人也仍旧操有混杂着普通话和东南亚语音的特殊腔调。我的大多数被采访者都承认他们曾因为语言问题而在就业上碰壁,或在日常生活中遭到冷遇。另外,前文中所讲到的社会歧视和不公正对待也强化了其内部的凝聚力,促使他们建构自己的群体和认同。最后,来自主流社会的消极看法又进一步强化了其建立独特认同的选择。总而言之,文化壁垒、结构性的弱势地位和来自他者的“错识”都促使香港印尼华人追求一种有别于本地人的认同,这是毋庸置疑

<sup>①</sup> 虽然在其他海外华人社会中,如美国,也不乏校友会的存在(Yang, 2001: 232—235)。但是,他们和印尼华人在香港的校友会会有本质的区别。首先,对于美国华人来说,校友会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华人团体并存。它不是惟一和重要的组织形式,而仅仅是对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有吸引力。其次,就整合华人社会的作用而言,校友会在其他华人社会中是十分有限的。但是,对于在香港的印尼华人来说,校友会发挥着支配性的领导和凝聚作用。

疑的。然而,文化差异、社会歧视和他者的偏见并不为印尼华人所独有,而是所有来港大陆新移民的共同经历。在这一点上,印尼华人同其他直接来自大陆的新移民并没有什么不同。引人深思的是,印尼华人并没有像其他来港的大陆新移民一样,认同与香港本地社会和融入已有的族群格局当中,反而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的群体。作者认为,这种认同困境来自他们独特的跨国移民经历。在经过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跨国迁徙之后,他们的认同不可避免地变得充满了冲突和歧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外地域性”特点。

## 外地域性认同

詹姆斯·克利夫德认为,移民本身是一种“旅行的文化”,它本身包含着“连续和断裂、本质和变迁以及同质和差异的历史性对话”(Clifford, 1992: 108)。当我们把注意力投向移民跨越时空的连续旅行过程,而不仅仅是他们与祖籍国的联系或者在移入国的生存状态时,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关于移民认同的不同画面。为了认清香港印尼华人认同的转变和特点,我在此借用王赓武教授对于华人认同维度的分类,<sup>①</sup>作为初步的分析框架,观察他们的认同沿着“种族”、“国家”、“阶级”和“文化”四个维度在迁徙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和最终达到的结果。

首先,就种族认同而言,香港的印尼华人从未怀疑和否认过自己的华人种族性。正是因为对自己的华人种族性认同,他们才离开印尼回到中国。移民到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之后,这一点也丝毫没有改变。正如我的一位被采访者所说,“我不认为自己是香港人,我是中国人。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怎么想,但是,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然而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海外出生地以及混杂的文化背景,无论在中国内地还是在香港,他们又常常不被认为是中国人,至少被认为不是“纯粹”的中国人。

其次,就国家认同或政治认同而言,很难说印尼华人究竟认同哪一个国家。作为一个跨国的移民群体,他们国家认同的对象是不确定的,甚至是缺失的。准确地说,他们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或者“全球公民”。我的一位被采访者这样说:

坦白地讲,我是中国人。我身体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然而,如果你问我属于哪一个国家或地方,我只能告诉你,哪里我可以过上好的生活,哪里就是我的地方。我就是地球上的人。

第三,在文化方面,他们的认同表现得更加复杂。他们的文化是一种综合了中国和印尼特色的混合文化。例如,他们虽然早已习惯香港本地的起居和饮食习惯,但仍然难以割舍对印尼食品和服饰的喜爱。在香港街头,不难凭着他们身上所穿的印尼蜡染服装,将他们同本地人区分开来。在语言方面,尽管普通话是他们之间的首要交流语言,但很多人都可以说流利的印尼话。在他们的刊物上,也时常可见用印尼文发表的文章。此外,受到印尼民族开朗乐观、能歌善舞的民族性格的影响,他们与一般中国人相比,更加活跃和外露。在每次印尼华人的聚会上,印尼歌舞表演都是深受喜爱的压轴戏。可以说,在文化上,“他们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印尼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Godley & Coppel, 1990b: 194)。

第四,尽管在香港印尼华人的个体之间存在着经济地位高下之别。但是,这种阶级上的差异并没有带来群体的分化。相反,无论处于什么样的阶级地位,他们都一致地认同自己的社团。我注意到,在巨港中学校友会内部,会员们的交往几乎不受职业或阶级地位的影响,而是以平等的校友关系相处。例如,有一次,我参加巨港华中校友会成立周年的联欢活动,表演节目时,一个普通的会员在台上扮演主角,风光无限,而一个赫赫有名的大老板竟然在旁边跑龙套,而且乐此不疲。台上台下其乐融融。

综上所述,在王赓武所提出的华人认同的四个维度中,对香港的印尼华人而言,每一个都是充满对立意义的聚合体。他们在人种学和生物学的意义上是华人,然而其华人的纯粹性又受到怀疑。他们的

<sup>①</sup> 王赓武认为,东南亚华人的认同是多元的,大体上由四种认同维度所组成,即种族认同、国家认同、阶级认同和文化认同,分别由体质规范、政治规范、经济规范和文化规范所规定。因此,对于东南亚华人而言,根据上述四种规范组合的不同,在个体当中呈现出多种变化形式(Wang, 1988: 11-16)。

文化是中印(尼)混杂的,他们的政治效忠是模糊的,他们的阶级地位是多样的。所有这些使得香港印尼华人的认同变得高度混杂和充满了内在的张力。有鉴于此,他们很难认同于香港本地社会,也无法认同香港已有的华人族群,不论他们是广东人、福建人、客家人、潮州人还是其他来港的大陆人。他们的惟一选择是建构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认同,我称之为“外地域性认同”(extraterritorial identity)。所谓“外”是指它在各种形式的疆域的限制之外。它不依赖任何地理和国家的实体或者僵化的种族和文化归属,而是依靠在自己群体内部的社会关系之上。这个概念至少有以下两个核心含义:

第一,既在此又不在此。大致看来,“外地域化”好像和李欧梵的“华人世界主义”(1991)有些类似,实则不然。“华人世界主义”描述了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心态:既固守中国文化的根源,又欣然接受多元文化的浸染,从而自由地穿行于所有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边界之间。它是一种有意识的从文化中心向文化边缘的回撤,以此实现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和文化优势。与此相反,“外地域性认同”从根本上打破了中心—边缘的话语支配权,它的力量恰恰来自对这种支配权的破坏与挣脱。它的价值在于,通过让移民归属于一个主观建构的、虚拟的、不受中心—边缘限制的地域,使得他们不再被边缘化所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虑所困扰,或者使得他们可以将这种焦虑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力量。这个新的地域,“不是一个单一的空间。它和任何其他的空间都有可比性和相似性。因此,它可以和其他任何空间互换。这样,一个人可以转换到其他的空间而不至于失去自己的认同”(Ma Mung, 1998: 40—41)。换言之,正因为他们将认同根植于社会纽带和文化的想象当中,而不是僵化的地理疆域,这种外于地域的认同才可以“既处处为家,又无处为家”;“既在此,又不在此”。

第二,既是华人又不是华人。“外地域性认同”对“华人性”进行了双重修正。首先,它否认存在一个一元化和同一性的“华人性”,强调华人世界的多样化和内在差异。如王赓武所言,“华人性”是一个类似光谱的东西,从中可以看到色彩各异的华人次文化。然而,该概念最本质的内容是对“华人性”本身的质疑。霍尔(Hall, 1992: 273—321)认为,在移民的体内,认同常常是相互对立的,将人拉向不同的方向,使其认同摇摆不定。在令人迷惑和转瞬即逝的认同的多种可能性面前,他们有时认同这个,有时又认同那个。为了克服这种真假难辨、左右为难的尴尬,就需要积极地建构一个全球化时代的认同,洪宜安(Ang, 2001: 50—51)大声疾呼,我们有必要“冲破华人性的牢笼”,去拥抱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多种多样的生活,而所有这些内容都远远超过了作为一个华人的含量。或者,通过有意识地投身于更广阔世界中,不断交叉、多样、意想不到的文化碰撞,建构一个开放和多元的“后华人认同”。

## 一个华人新族群的建构

如上所述,香港印尼华人的“外地域性认同”决定了他们难以认同香港其他的华人族群。作为华人族群重要组织原则的籍贯和方言,对于印尼华人来说,几乎变得毫无意义。他们只能认同自己的群体,其群体中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他们族群建构的惟一新基础。香港的印尼华人创造性地利用了两种社会关系,来达到族群建构的目的。一个是新的地缘关系,另一个是经过改造的校友关系。以下以印尼巨港中学校友会为例加以说明。

首先,对于香港的巨港华人来说,中国的祖籍地虽然存在,但是遥远而且陌生。他们与祖籍地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具体实在的联系,更没有情感和责任的牵扯。相反,他们在印尼的出生地——巨港,不但有他们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而且,许多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仍然生活在那里。因此,巨港代表了他们的共同根源。它取代了中国大陆的祖籍地,成为了他们新的“籍贯”。所有来自巨港的华人,无论原来是广东人、福建人还是客家人,都彼此认作“同乡”<sup>①</sup>。正如该校友会的章程和该会的领导人所一再强调

<sup>①</sup> 也许仍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乡”、“乡下”或者“故乡”只能是指中国大陆的某个地方,而海外的出生地,无论怎样重要,都没有使用“故乡”的合法性。所以,我发现,他们从来不使用“同乡”这个词。但实际上,在他们中间,无疑已经形成了一种类似同乡的纽带。

的,凡是巨港的侨胞,无论籍贯、年龄、贫富、政治立场,都可以是该会的会员。此外,尽管在与社会其他群体交往的时候,他们普遍使用广东话,而且已经毫无交流的障碍。但是,在他们的群体内部,普通话始终是第一交流语言。似乎可以说,普通话已经取代了他们各自的方言,成为他们共同的语言,或者说是新的“方言”。

其次,虽然新的地缘关系成为联系他们的有力纽带,但是真正为巨港华人提供可供操作的组织原则的,是一种经过改造的校友关系。具体来说,是一种“拟宗族化”的校友关系。田汝康(T'ien, 1953: 25—26)在对沙捞越华人社会的研究中发现,为了经济合作的目的,两个来自中国不同省份、操不同的方言,而且毫无族谱关联的田姓群体,发明了一个共同的祖先,并且彼此以亲戚的名分相称。类似的是,由于担心松散的地域和校友关系难以起到建立和维系群体的作用,巨港华人借鉴了中国人传统宗族关系的关键元素——祖先、世系和祖产(Freedman, 1957),对校友关系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具体来说,首先,已80多岁高龄的赖先生,原是巨港华侨中学的校长,被巨港华人当作他们的精神“祖先”。他们每年都组织活动庆祝他的生日,而且定期组织纪念母校的聚会。所有这都可以被理解为祖先祭拜的隐喻。其次,不同年级的同学构成了不同的“世代”。最后,校友会的基金成为“祖产”,用来组织活动,开展福利和维系该群体的发展。该结构与传统的华人宗族结构十分相似,可以看作是对前者的改造和模仿,为巨港华人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宗族谱系。依据这个谱系,他们可以轻易地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找到确定彼此关系的坐标。<sup>①</sup>

综上所述,在跨国移民的过程中,印尼华人不得不面临种种变化的挑战。在失去了传统籍贯和方言基础的情况下,他们创造性地发明和使用了新的认同基础和组织原则。在新的地缘(海外出生地)和新的方言(普通话)的基础上,依靠“拟宗族化”的校友关系,建构了崭新的华人族群。

## 印尼华人族群的经营和表达

香港印尼华人的自我认同和族群建构是通过不断的表达来经营和实现的。这种表达主要通过以下两种场合和方式:一是校友会内部的活动,我称之为“内向性表达”;另一是通过跨社团的联合活动,我称之为“外向性表达”。

### 内向性表达

到2002年为止,巨港校友会共举行了八次有全体成员参加的活动。其中,七次是校友会成立周年的纪念和庆祝活动,一次是母校巨港中学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根据采访和校友会会刊的报道得知,所有这些大型活动都遵循一个类似的程序。首先,由校友会主席致辞,宣布大会开始;接着是赖校长讲话;其他应邀参加的兄弟校友会代表作简短的发言;接下来是大会的主要内容:宴会和文艺表演。在此期间,穿插着一些其他活动,如为在该年中学毕业考试中成绩优秀的校友会会员子女颁发奖学金等。此外,抽奖游戏也常常贯穿着整个活动。<sup>②</sup>为了更好地分析印尼华人认同和族群的自我表达,我将在下文“深描”(Geertz, 1973)巨港华人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活动——“纪念巨港中学建校50周年庆典”。

### 场景和程序

该活动在九龙某大型展览中心的多功能厅举行。大厅中,72张圆桌有秩排列,每张桌子上都有编号。刚刚步入大厅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飘荡在空中的欢快、优美的歌声。一位身着印尼服装的女歌手正站在舞台边,在一个小乐队的伴奏下,欢快地唱着印尼歌曲。校友们彼此热情地打着招呼,气氛热烈。一共有800多人参加了这次聚会。除了巨港校友会的成员外,还有香港主要的东南亚华人团体所派的

<sup>①</sup> 关于巨港中学校友会的组织结构和具体活动内容,参见王苍柏,1999:55—66。

<sup>②</sup> 在多次参与观察中,我发现,这其实也是许多其他香港印尼华人团体开展活动时所遵循的一般程序。

代表。此外，香港以外的巨港华中校友会，包括在大陆和印尼的巨港华中校友会，都派代表团参加。<sup>①</sup>可以说，这是一次印尼巨港华人的跨越国界的“家庭聚会”。

在会议开始之前，社团领袖和客人依次在主席台入座。首先是赖校长，然后是校友会前主席和现任主席，接下来是“中联办”的代表，广西和天津侨联的代表，再后面是母校教师的代表，最后是 11 个巨港校友会的代表。

校友会现任主席首先致词。然后，赖校长和两名前母校的教师讲话。接下来是广西和天津侨联的代表致词。最后，一位来自雅加达的巨港华人代表海外所有巨港华人发言。会上还宣读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巨港华人给大会发来的贺电和来信。致词结束后，宴会随之开始。与此同时，文艺表演也开始进行。一共有 14 个节目，全部由校友会成员自己表演。在所有节目中，超过一半是印尼歌舞，其他是中国的民间歌舞。演出高潮，许多与会者纷纷离座，在欢快的印尼音乐伴奏下，围成一个圆圈，载歌载舞。聚会持续了大约 4 个小时。最后，在“友谊地久天长”的歌声中结束。

#### 策略和含义

上述庆典是巨港华人对自己的族群认同进行经营和表达的最好场所。他们所采用的表达策略及其含义，作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通过讴歌母校和赞扬海外华文教育，强调自己的中国人的种族性。在校友会主席和赖校长的致辞中，都对母校——巨港中学，给予了高度的赞美。如称它是“苏（门答腊）南最高学府”，其成绩“将永载海外华人教育的史册”。此外，母校的地位也反映在会议程序的安排中。一般而言，在中国人的社交场合，政府官员往往被请到主席台就座并且发言。但是，在该活动中，作为一介平民的赖校长第一个就坐，位于中央政府驻香港的官员和来自中国内地的侨务部门的官员之前。在活动进行当中，赖校长和其他原巨港中学的教师，还被授予奖章，以表彰他们对华文教育所作的贡献。

上述对巨港华文中学校以及教师的高度评价，既不是因为该学校在海外华文教育中真正有什么无可取代的贡献，也不是出于对赖校长个人的崇拜，而似乎应当理解为，这是巨港华人对于自己作为中华文化合法继承人地位的一种重申和展示，以此强调和明确其作为中国人的种族认同。

第二，通过文艺表演来彰显他们的印尼背景。与在历次聚会中一样，在该次庆典中，印尼音乐、印尼民歌和舞蹈仍然是最核心的内容。色彩丰富的印尼传统服装和优美的音乐，象征着他们与印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印尼文化在香港的奇特“复兴”，作者认为，其背后根本的动机，是为了唤起和传承关于他们印尼背景和经历的集体记忆。

第三，通过强调“慕西情”来增强巨港华人作为跨国群体的凝聚力。“慕西”是一条穿过巨港的河流的名字，也是他们的出生地和童年回忆的代名词。对巨港华人来说，它意味着他们这个群体的共同根源和校友之间的纯朴和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慕西”已经成为跨越国界的巨港华人联系纽带的象征。在文艺表演中，第一个节目就是以“慕西赞歌”为题，由赖校长作词的合唱。此外，如前所述，全球不同地方的巨港校友会都选派代表参加，或者发来贺电。在聚会的尾声，“友谊地久天长”的歌声再次重申了巨港华人的凝聚力。

总之，巨港华人有策略地利用了一系列表达技巧来彰显他们的认同。通过有意识地操作各种文化符号，例如赖校长的崇高地位、印尼风格的歌舞表演和对“慕西情”的歌颂等，成功地化身为一个“象征性种族……对该种族而言，重要的是种族文化的符号而不是文化本身”（Alba, 1990: 306）。通过这种“象征性种族”的建构，巨港华人在香港的族群结构中开创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种族壁龛”而得以立足，同时也彻底改变了香港原有的华人族群地图。

#### 外向性表达

<sup>①</sup> 在香港以外，一共有 10 个巨港华中校友会，分布在雅加达、巨港以及中国大陆的北京、上海、广州、桂林、天津和厦门等地。其中，最早的校友会成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但大部分校友会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成立的。

在1997年中国政府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前,香港的东南亚华人很少组织公开的大型活动。他们主要在各自的社团内部,开展一些诸如联欢、福利、娱乐等活动,很少引起香港社会的注意。然而,随着“九七”的临近,出现了一股华人社团联合举办大型活动的热潮。第一次这样的活动就是1997年举办的“香港侨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大会”,邀请了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和许多社会名流参加。其活动也以大版面见诸报端(香港侨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委员会编,1998)。

这些跨社团的活动有两个主要特点:

第一,政治性强于娱乐性,并且带有明显的支持北京中央政府的色彩。单单从他们活动的主题就不难看出这一点。例如,“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和“海峡两岸同唱一支歌”等。另外,每次活动都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中联办的官员等出席。而且,每次活动之后,《大公报》和《文汇报》均大幅给与报道,而其他香港报纸则一笔带过或鲜有提及。

第二,在这些活动中,通常也有一些表演节目,但节目的内容与前文所描绘的巨港校友会的表演内容截然不同。欢快的印尼民间歌舞被中国大陆风格的文艺表演所取代,参加表演的也多是内地请来的专业演员,而不是华侨社团的成员。此外,演出的内容不再是对印尼风情的怀恋和对青春往事的追忆,而是对中国的赞美和对香港未来的歌颂。

令人感兴趣的是,我发现巨港华人对于参加这种大型活动有一种模棱两可的心态。表面上,他们和其他华侨社团一样,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其实,他们有意识地与这些活动的倡议和主办者——香港华侨华人总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sup>①</sup>对于巨港华人和总会的这种暧昧关系,作者认为,反映了他们认同和族群表达中的一种矛盾心态。他们既希望保持一种独立的认同,避免带有过多的政治色彩、卷入过多的政治活动中,因为他们过去已经吃够了苦头,同时,他们又希望利用主权回归的历史性机遇,通过策略性地“强化中国人的一面”(Godley & Coppel, 1990b: 194),在后殖民的香港特区政府的权力分配中,获得比以前更多的份额。正是出于这个功利性的目的,他们掩藏起对政治的漠然和恐惧,通过认同的外向性表达,向世人展现出自己对特区和北京中央政府的效忠。

## 结 论

传统的观点认为,籍贯和方言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石,也是海外华人最主要的社会组织原则。这两种社会关系构成了华人认同的基础和族群建构的依据。本文显示,随着移民进程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扩展,上述观点已经不合时宜。华人在迁移的过程中,其原有的认同基础往往失去了作用,而被新的认同所代替。与此相伴的是,华人族群关系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层次、类型和流动性。

本项基于香港的研究证明,移民可以创造性地适应环境,通过发明新的认同基础和改造已有的认同原则,建构出新型的华人族群。首先,香港印尼华人的认同在跨国的迁徙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放弃了传统的以祖籍国的地缘和方言为基础的认同,转而构造一种前所未有的“非地域性认同”。该认同“不再依靠任何为统治以及疆域所限定的国家,而是把自己的信念寄托在自己所属的社会体当中。就如同把对土地的依恋转变成对灵魂的依恋……(与此同时)他们对自己外部的世界保持着警惕和怀疑”(Ma Mung, 1998: 40—41)。印尼华人不再去苦苦地寻找家园作为建构自己认同的基础,对他们而言,“家”不在别处,就在他们的灵魂当中。

其次,虽然“外地域性认同”不受严格和僵化的地理和国家的疆域所限,是“连根拔起”的。然而,它并非如王爱华和诺尼尼(Ong & Nonini, 1997)在其《华人跨国主义:没有根基的帝国》一书中所言的那么“没有根基”。事实上,华人移民的认同和族群建构并没有完全独立于中国社会传统的地缘和血缘的关

<sup>①</sup> 只是他们的社团领袖礼貌性地作为支持者或者协助者参加,让自己的社团成为名义上的参加者。实际上,校友会的成员很少参加具体的活动。

系脉络之外。相反,正是通过对原有地缘和方言的不自觉的“革新”,香港印尼华人才顺利地找到重建联系的纽带;同样,正是通过对传统宗族制度的创造性“模仿”,他们才成功地改造了校友关系,使其成为非常有效的族群建构的框架和基础。

第三,在确立了认同和族群建构的新的基础和原则之后,香港印尼华人作为一个族群,其真正的建立是在经营和表达中逐渐实现的。他们以“内向性表达”和“外向性表达”两种方式,通过对文化符号的策略性的经营,使一种“象征性的种族”的出现成为可能。我们第一次看到来自不同籍贯和方言背景的华人移民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华人族群,从而缔造了“更多一层的华人性”(Wang, 1997: 147—166)。

可以预测,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华人族群的人文地图必将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引发对于种族、认同等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作为“考察全球化的扩展和当今社会众多关系的一个出发点”,华人移民研究必将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探索做出更大的贡献。

#### 参考文献:

陈禹山, 1990《港澳名人与精英》(第一辑), 香港: 先达出版社。

澄雨, 2001,《不速之客: 八十年代香港电影的大陆来客形象初探》, 吴俊雄、张志伟编:《阅读香港普及文化, 1970—2000》, 香港: 香港牛津出版社。

郝时远, 2003《答“问难 族群”》,《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3期。

《华人月刊》, 1984年3月第2期。

《镜报》, 1979年7月、1980年12月、1982年7月。

李海天, 1987,《香港归侨的状况》,《香港侨友社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 香港: 该会。

纳日碧力戈, 2003《问难“族群”》,《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1期。

潘蛟, 2003《“族群”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9期。

《七十年代》, 1980。

阮西湖, 1998《关于术语“族群”》,《世界民族》第2期。

王苍柏, 1999《香港归侨团体研究: 以巨港(香港)校友会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47期。

香港侨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委员会编, 1998,《香港侨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特刊》。

庄国土编, 2000《中国侨乡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Alba, R. D. 1990. *Ethnic Ident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White Ame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g, I. 2001,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Clifford, J. 1992, “Traveling Cultures.” in Grossberg, L., Nelson, C. & Treichler, P. A. (eds.),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Cohen, R. 1997, “Diaspora, the Nation-State, and Globalisation.” in Wang, Gungwu (ed.), *Global History and Migration*, Westview Press.

Crissman, L. W. 1967, “The Segmentary Structure of Urb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Man* (n. s.), Vol. 2, No. 2.

Douw, I, Huang, C. & Godley, M. R. (eds.) 1999, *Qiaoxiang Tie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Cultural Capitalism' in South China*, London, England: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1995,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in Asia*, Parkes, ACT: 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Freedman, M. 1957, *Chines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Singapore*, H. M. S. O., London.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Godley, M. R. 1989, “The Sojourner: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cific Affairs*, Vol. 62, Issue. 3.

Godley, M. R. & Coppel, C. A. 1990a, “The Indonesian Chinese in Hong Kong: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a Minority Community in Transition.” *Issues and Studies*, Vol. 26, No. 7.

——1990b, “The Pied Piper and the Prodigal Children: A Report on the Indonesian Chinese Students Who Went to Mao’s China.”

- Guldin, G. E. 1977, "Little Fujian (Fukien): Sub-neighborhood and Community in North Point,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7.
- 1997, "Hong Kong Ethnicity: Of Folk Models and Change." in Evans, G. & Tam, M. (eds.), *Hong Kong: The Anthropology of a Chinese Metropolis*,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 Hall, S. 1992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Hall, S., Held, D., & McGrew, T. (eds.),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Kuan, K. E. & Wong, S. L. 2001, "Dialect and Territory-Based Associations: Cultural and Identity Brokers in Hong Kong." in Lee, P. T. (ed.) *Hong Kong Reintegrating with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Lee, L. O. F. 1991, "On the Margins of the Chinese Discourse: Some Personal Thoughts on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the Periphery." *Daedalus* (Spring), Vol. 120, No. 2.
- Lin, G. C. S. 2002a,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Geography of (Sub) ethnicity in Hong Kong." *Urban Geography*, Vol. 23, No. 1.
- 2002b, "Hong Kong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Asia Pacific Viewpoint*, Vol. 43, No. 1.
- Liu, H. 1998, "Old linkage, New Networks: The Globaliz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5.
- Ma Mung, E. 1998, "Groundlessness and Utopia: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Territory." in Sinn, E. (ed.), *The Last Half Century of Chinese Oversea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Ong, A. & Nonini, D. M. (eds.) 1997,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 Sinn, E. 1997, "Xin xi guxiang: A Study of Regional Associations as a Bonding Mechanism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The Hong Kong Experience."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31, No. 2.
- 2002, "Tongxiang Associations and the Centering of Hong Kong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World." *Presented in Repositioning Hong Kong and Shanghai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une 11, 12.
- Sparks, D. W. 1976, "The Teochiu: Ethnicity in Urban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6.
- T'ien, J. K. 1953, *The Chinese of Sarawa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
- Wang, G. W. 1988,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Cushman, J. W. & Wang, G. W. (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1997, "Hong Kong as the Home of China Coast Chinese: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Wang, G. W. & Wong, S. L. (eds.)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Rising to the New Challenges*, HK: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Wong, S. L. 1988, *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ang, F. G. 2001, "PRC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Demographic Profile and An Assessment of their Integration in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in So, Y. Lin, N. & Poston, D. (eds.), *The Chinese Triangle of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作者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志敏